

主編 宮曉卫
執行主編 李國庆 王振良 袁鴻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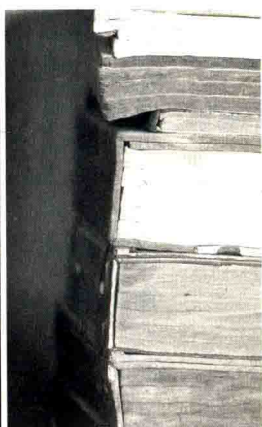
藏書家



第17輯

齊魯書社

BIBLIOPHILE



第17辑

齊魯書社

藏書家

主編 宮曉卫
執行主編 李国庆 王振良 袁鴻蕙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藏书家. 第 17 辑 / 宫晓卫主编. — 济南: 齐鲁书社,
2013.8

ISBN 978-7-5333-2884-9

I. ①藏… II. ①宫… III. ①藏书—文集 IV.
① G253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47732 号

藏书家 第 17 辑

宫晓卫 主编

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
地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
邮政编码 250002
网 址 www.qlss.com.cn
电子邮箱 qilupress@126.com
制 版 北京三希堂图文设计有限公司
印 刷 北京奥美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印 张 12
字 数 160 千
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33-2884-9
定 价 28.00 元

新 书 掠 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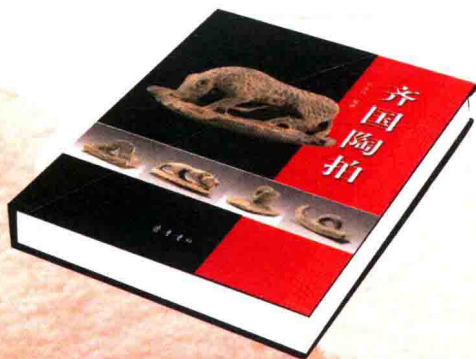
海岱古族古国吉金文集

陈青荣、赵缙编著 16开 精装 6册 1980.00元
ISBN 978-7-5333-2536-7



章太炎藏书题跋批注校录

罗志欢主编 32开 精装 1册 158.00元
ISBN 978-7-5333-2615-9



齐国陶拍

孙永行编著 16开 精装 1册 360.00元
ISBN 978-7-5333-2670-8

《藏书家》编委会

学术顾问：来新夏 姜德明 李致忠

主 任：李 培 付双全 官晓卫

特约审稿人：周 晶 韦 力 杜泽逊

编 委（按姓名音序排列）：

陈子善 范景中 龚明德 李际宁 刘玉才

倪墨炎 彭震尧 沈 津 时永乐 涂宗涛

王稼句 韦明铤 翁连溪 谢其章 徐 雁

薛 冰 杨成凯 郑伟章

主 编：官晓卫

执行主编：李国庆 王振良 袁鸿蕙

目 录

开卷新谈	01	刘尚恒：中国藏书文化研究散议
藏家点将	07	金晓东：蒋光燊千里护书
	14	李关勇：侨居济南的藏书家柳堂
	19	高洪钧：藏书家和藏书楼轶闻两则
天禄寻踪	23	刘 蕾：文源阁址话今昔
	31	云从龙：前世今生新风楼
书海披沙	37	郑伟章：津门读书记（上）
	42	童正伦：南三阁《四库全书》零本寻访记
	46	陈汝洁：《徐夜诗集校注》的误收与失收
	49	薛 冰：《青崖文苑》第一集
簿录萃英	52	曲振明：中国烟草著述考（一）
	60	杨传庆：郑文焯批校词集略记
	66	杨 栋：在淘宝网上“淘宝”
	72	蒋颖馨：新文学特印、限定本举隅（续）
旧籍重温	74	栾伟平：李盛铎李滂父子致王文进信札选注
馆藏故事	79	李致忠：陶陶室藏“两陶集”流传始末（上）
缥緗闲话	84	沈 津：老蠹鱼札记（一）
	90	辛德勇：周绍良先生旧藏图书题跋两则
	93	韦 力：顾兰泽稿本《小石山房书目稿》

- 98 顾 净：明代版刻三题
101 徐徐堂：清季活字本《补农书》书后

文津茶座

- 104 翁连溪：晚明春宫版画述略
114 林振岳：四部丛刊本《大云山房文稿》底本小考
118 致 之：喜见功深力作成——读《新辑红雨楼题记》

故纸遗闻

- 124 雷梦辰：津门书肆二记（一）
133 鲍国强：高价古籍善本成交的内在因素

异域芸香

- 136 张元卿：安岩别录

故老追怀

- 142 周 晶：落叶时节忆黄裳
147 肖伊绯：与黄裳先生的一面之缘
150 柳向春：缅怀文献学家王欣夫先生

蠹鱼杂忆

- 157 韦 泱：我与文庙
164 张铁荣：我所收藏的“周作人”
167 王 朋：我与《鸿雪因缘图记》的因缘
170 时永乐：两宜轩本《说文解字注》

琅嬛琐录

- 173 杜云虹：王筠著述书板入藏鲁图始末
176 沈文冲：鲁迅“毛边到底”与《呐喊》初版毛边书

181 编后记（附栏目简介）
184 稿约

中国藏书文化 研究散议

刘尚恒

昔年作《中国藏书文化散论》，首刊于《图书馆工作与研究》1998年第2期，讲的是藏书文化的意义，不意先后为《北京日报》（2001年7月23日）、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》全文转载，再收入《中国古代藏书楼研究》、《二馮斋说书》（改题《中国藏书文化之三昧》）专著中，可谓颇具一定影响。当时还有作《中国藏书文化研究散议》的设想，愿就藏书文化研究中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作一探讨，无奈琐事猬集，心绪不整，一直搁置下来。今逢《藏书家》再度复刊，承李国庆先生之邀，故以此题相呈，把我的一些不成熟想法写下来，抛砖引玉，供同好和同行们讨论，并希望就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达到共识。

一、藏书家概念限定

中国藏书历史源远流长，春秋时代即已滥觞，唐代印刷术的发明和运用，促使社会书籍大量方便产生，藏书文化初步形成，至宋代有了完整藏书文化体系，明清发展至鼎盛，近现代迄今仍传承不衰。“藏书”一词本意就是书籍的收藏，最早见于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谓汉孝武帝“建藏书之策，置写书之官”。而“藏书家”一词出现较晚，以笔者所知，最早见于南宋叶梦得《过庭录》，云：“公卿名藏书家，如宋宣献、李邯郸，四方之民如亳州祁氏、饶州吴氏、荆州田氏等，吾皆见其目，多止四万卷。”（《文献通考·经籍考》卷一）将宋绶、李淑以及祁元振、吴与、田伟等列为藏书家（宋代私人藏书家据

统计多达近千人），明清之后，称藏书家者指不胜数。

然而什么是藏书家，即藏书家的概念是什么呢？文献中并无确切记载，更谈不上有确定的标准。记得1996年12月在天一阁建阁47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，与会者谢灼华、黄宗忠、徐雁、田涛、骆兆平、顾志兴、范凤书等当代名家讨论了这一问题，围绕“家”一词各持所论，并未形成统一认识。

清代乾隆时开四库馆，征集天下遗书，命各省督抚、学政采进私家藏书，以彰千古同文之盛。乾隆三十九年（1774）七月二十五日上谕指出：“其一人而收藏百种以上者，可称为藏书之家。”（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首）此若以藏书量百种为限，未免失之太宽，若以进呈百种宋元珍本善本书而言，则未免失之过严。

这里我还想到一个故事：清末淮军将领刘秉璋到同僚张树声家谈及家藏书事，树声之子问刘家有多少宋元善本书，刘一时语塞，答不上来，于是树声之子鄙夷地说刘算不上藏书家（见《苕楚斋随笔》）。以所藏宋元本书为标准，显然行不通，即使明清时代也找不出几个，近现代更不用说了。陆心源皕宋楼，号称两百部宋版，实际也只得一百多种，清代皇家的天禄琳琅，汇集历代内府遗珍和私家藏书之精华，然所著录的宋版书，其中也不乏大量的误明刻，甚至清刻的赝品（参见刘蔷《天禄琳琅研究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2年9月）。

或曰藏书家是“指私家藏书的开创者或私家藏书的传人、皇家藏书的管理者于藏书事业作出贡献的人”（《中国历史藏书论著读本》第7页，四川大学出版社，1990年7月），这显然也不能成为藏书家的概念。前者空泛无实际内容，后者则属于今日之各级图书馆工作者，这些藏书的典守者，在古代都有特定的史官职名（如史监、孔目等）。老子为周之柱下史，即国家图书馆馆长之类，然凭此不能断老子为私家藏书第一人。

概念是事物本质属性的表述，必须找出藏书家的本质属性，方可定概念。藏书家的本质属性应是“收藏”二字，这如同丛书的本质属性在于“书的汇集”一样，考察某人是否属藏书家，就是考察他是否有收藏意识。为此，我不揣浅陋提出：藏书家应是指有明确的鉴赏、阅读目的，且具一定规模的图书收藏者。这里的“图书”是广义的，它包括字画、碑帖等。明代项氏天籁阁中藏名家书画甚多，清代叶昌炽、近代缪荃孙所藏碑帖也夥。至于“一定规模”，应以时代、地域而异，难以用数字来确定。这里宜粗不宜细，然而文献记载中“沉湎书籍”、“酷嗜文史”之类人，应不属藏书家之列。至于书肆、书店等书业藏书，应纳入图书的流通环节，虽属于藏书文化研究范畴，而其主人不能简单地通称为藏书家，因为店主们的收藏目的在于转卖。

二、藏书家的类型

历史上藏书家数以万计，且各具个性。明代胡应麟将其分为好事家和赏鉴家（《少室山房笔丛·经籍会通》），清代洪亮吉分为考订家、校雠家、收藏家、赏鉴家、掠贩家（《北江诗话》），清末叶德辉据洪说修订为著述家、校勘家、收藏家、赏鉴家、掠贩家（《书林清话》），近代缪荃孙分作赏鉴、收藏两类（《古学汇刊序目》），今人程焕文归纳为学问之藏书家、收藏之藏书家、掠贩之藏书家，又依据对藏书的流通态度提出“开放派”和“保守派”两类。

上述这些分类都有一定道理，却又失之有偏。纵观历史上藏书家都与学术文化事业密不可分，同时身为著述家、书画家、考订校勘家者所在多有，很难具体确定为何种类型，因此这些分类并无多少实际意义，譬如黄丕烈，说他是收藏家、赏鉴家，他酷嗜宋版书，有“佞宋”之称，士礼居藏书声满天下；说他是考订校勘家，他的《士礼居丛书》声名卓著，他考订的《战国策》中“触龙言愿见太后”而非“触薈愿见太后”，为1972年发现的山东银雀山竹简证实；说他是掠贩家，他确实在苏州开设“滂喜园”书肆，既卖自刊自藏书，也卖“故家以书籍来售者”。这种从藏书利用上划分类型，确实很难将他们分开。因此我们不妨从其他角度来考虑藏书家类型，如：

从藏书家的身份上可分官宦之家（文官和武官）、士子之家、释道之家等；从地域上可分为全国性的藏书家（如皇室内府、国子监）、各省地县的藏书家等；从时代上分为通代性（如延续数世的藏书世家）、断代的（各时代藏家）等。从藏书隶属上分为官府（从内府到府县衙门）、书院（从国子监到府县学）、寺院（释道寺观）、私家（从官宦到士子）、家族（祠堂、义塾）、社团藏书等。

从藏书隶属上分类，前四类广为人们认同和注意，后两类却不为人们认识。所谓家族藏书，是指某一氏族共同集资、共同管理、共同利用的藏书行为。发轫于唐，兴盛于明清（尤兴于明代大兴祠堂之后），如阳湖孙氏祠堂、高邮胡氏家祠、泾县朱氏培风阁、绩溪胡氏世泽楼等，既不属官藏，也非纯粹的私家，与书院、寺观也无涉。其中朱氏培风阁最为典型（参见拙作《家族藏书重教与家族人才成长——清代中期泾县朱氏培风阁藏书》，载《图书馆工作与研究》2001年第6期）；社团藏书为某社团集资购书、管理，供本社团人员利用的藏书行为，如商务印书馆的涵芬楼。

至于程焕文先生从藏书流通的态度上区分为“开放派”和“保守派”两类，也似乎很难说清。我国私家藏书固然有“鬻与借人为不孝”的保守派，也有“不吝假借”，供乡里士人、贫困学子借读的（甚至为之提供食宿），还有

提倡“散书论”（袁枚）和“儒藏说”（周永年）的，更有灵隐书藏、焦山书藏之设，直至清末绍兴徐树兰的古越藏书楼，开近代图书馆之先河。更多的藏书家其藏书供本人、子侄弟子、良朋好友借读，可谓半开放派。对于古代藏书流通，我们不应以近代的流通方式手段来要求、苛求古人。

三、中国藏书文化的优良传统

历史上数以万计的藏书家，他们的藏书历程各不相同，学行有别，然而大多数藏家所走的路子是相同的，并逐渐形成中国藏书文化的优良传统，这就是聚集、校勘、刊印。兹略作分述如下：

一、聚集：藏书家首先是聚集图书，虽然各人身世、经历不同，而聚集图书的方式不外乎购、抄、换、获赠四种形式（或曰手段）。

（一）购：以自己的俸禄或家产，节衣缩食、典当、借贷四方购求图书，乃至因此致贫潦倒，所谓“黄金散尽为收书”即道其状况。

（二）抄：印刷术发明和运用之前，人们只能靠手抄来获得图书，印刷术发明和广泛运用之后，对于无力、无从购得的图书，特别是孤本、珍善本，也只能依靠手抄，同时手抄可以加强记诵。为了抄书，他们不论酷暑严冬，晨昏不辍，十指如槌，目为之眈。为此对心仪久之的图书，朱彝尊不惜被罢官，还有的人家贫无力，靠抄他人书成“家”的（如吴翌凤），而明末毛晋开创的影抄（毛抄），则声满天下，被誉为下原书一等。

（三）换：以田地产、贵重物品（珠宝首饰）乃至心爱的奴婢去换他人图书，如明代王世贞以一庄园换宋刻两《汉书》，清马思赞以十亩地换宋刻《陆状元通鉴》，明朱大韶（一说朱承爵）以家中美婢换宋刻《后汉纪》，清陆深以手抄本换刻本等。

（四）获赠：文人之间友谊笃厚，以图书相互馈赠，如宋井度赠书于晁公武，明代杨循吉提出“朋友有读者，悉当相奉赠”，清李延昱赠书朱彝尊，顾湄两赠宋刻本《陶渊明集》给钱曾。还有更高规格的朝廷颁赐书，如明代藩府中的“御书楼”、“赐书楼”之类，又四库馆时马氏小玲珑山馆、范氏天一阁、汪氏飞鸿堂、鲍氏知不足四大家获赠《古今图书集成》、《佩文韵府》等。

此外还有巧取豪夺者，如宋之郡守陈规、奸相之子秦熈夺王莘、王铎父子藏书，明代千夫长汪六水夺项氏天籁阁藏书，奸相严嵩夺四方宋元版本甚多，清丁日昌以苏松太道之官威夺郁氏宜稼堂、顾氏艺海楼藏书。这些巧夺者只是为显富斗奇，将书当做“古董”，既不去认真校读，也不从事刊印传世，除了客观上保存典籍之外，实在没有什么作为，如丁日昌的《持静斋藏书

纪要》乃出自莫友芝代编并序，他的《百兰山馆藏书目录》也是林泉达代编并序的，这些另当别论。

二、校勘：藏书家聚集众多版本图书，常以各本之间的文字差异对勘校订，纠正原书中脱漏衍误、鲁鱼亥豕之说，包括书名、作者、内容、版本的考订，形成校勘学，这不仅大大提高了文献质量，而且为后人提供阅读方便。

三、刊印：藏书家刊印书大抵有三类：一是通过阅读形成自己的著述，历史上藏书家几乎都是著述家。二是将自己珍藏的孤本、珍善本刊印传世，化身千百，使罕见之物成为常人易得之物。三是利用自己丰富的藏书编纂、辑佚图书，官府如此，私家也如此，如清代朱彝尊的《词综》、钱谦益的《列朝诗集》、马国翰的《玉函山房辑佚书》等，皆因此而出。

中国藏书文化优良传统沿袭千年之久，直到近现代的藏书家们仍坚持这一传统（如周叔弢、徐乃昌、刘世珩等）。到了当代，由于时代变迁、书籍产生的变化，这一传统被打破了。他们只注重“聚集”，而“校勘”、“刊印”则少见，可是藏书的路子却大大拓宽了（如连环画之类的新品种收藏）。从总体上说，藏书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，大有可为。

四、藏书文化研究对象和内容

藏书文化是研究历史上各类官私藏书事业，探讨其规律和特点。它的内容十分广泛，我粗拟出以下几点：

- 一、藏书与各时代、各地域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关系，即时代与地域的特点；
- 二、藏书与各项文化事业密不可分的关系；
- 三、藏书与藏书家的概念、类型、传统、历史演变；
- 四、图书的产生（出版、刻工）、流通（旧书业的兴衰）、收藏三个环节；
- 五、藏书家生平事迹，其聚集、校勘、刊印历程；
- 六、藏书传递原委；
- 七、藏书印鉴（名章、闲章）研究；
- 八、藏书文化的比较研究（时代、地域，中国和外国）；
- 九、藏书楼的选址、建筑、管理制度、命名研究；
- 十、藏书家个体与群体研究；
- 十一、各类专题藏书研究（如清宫、天禄、七阁等）；
- 十二、通代和断代、全国性和地域性藏书研究等。

中国藏书历史悠久。季羨林先生说过，中国是一个爱读书、爱藏书的国度。而藏书文化研究却远远落后于此，虽然自《汉书·艺文志》以来，历代艺

文志、经籍志都有藏书事实记载，宋以来的笔记杂著也屡有记录，然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，只能从明代祁承燾的《淡生堂藏书约》算起，时间不过三百年之久，自从叶昌炽的《藏书纪事诗》出，藏书研究大兴，各类著述涌现，人才辈出。改革开放三十年来，各项事业欣欣向荣，宽松的政治环境保障了各项研究事业蓬勃开展，尤其近十多年来，藏书文化作为传统文化中的热点，研究状况如日东升，大量的藏书文化的论文、专著出版之外，还有专门性丛书出版，如《书林清话文库》、《观澜文丛》等，有了全国性的通史《中国藏书史》、《中国藏书楼》、《中国私家藏书史》等，地域性的如浙江、江苏、山东、山西、广东、安徽等省级藏书史以及常熟、宁波、南京、苏州等地市级藏书研究，更出现一批有相当学术水平的中青年研究者，这期间徐雁先生可堪称当代中国藏书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。琳琅满目、美不胜收，然而也毋庸讳言，综观当前的研究还是缺乏深度，如个体研究多，群体研究少，一般介绍评述的多，专题和比较研究的少，缺乏把藏书文化放在特定的时代、地域背景下研究与其他事业的关系。三十年前，徐雁先生在《中国历史藏书论著读本》序言里，引用范文澜先生提出的“直通”、“旁通”、“会通”的史学思想，在藏书文化研究实践中依然少见。中国藏书文化研究大有可为，大有拓宽和加深之必要，我寄厚望于未来者。

蒋光焄千里护书

金晓东

在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室琳琅满目的典藏之中，有一宗来自浙江海宁硖石镇衍芬草堂的藏书，其中有宋小字本《晋书》、存世孤帙宋本《律》、北宋刻南宋补版《后汉书》、宋绍兴两浙东路茶盐司本《外台秘药方》、南宋本《通典》、平水刻书代表作《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》、明弘治十四年（1501）涂楨刻本《盐铁论》等。这些珍本经历数百年，仍被完好保存并最终归公，这都要得益于它们的主人——藏书家蒋光焄。

蒋光焄（1825—1892），字绳武，号寅昉，亦号吟舫、敬斋。海宁硖石镇人。自其祖父开始藏书，历经三代，积数十万卷。清咸丰末，太平天国兵临江浙，蒋光焄携书溯江而上，远赴武昌以避战火，同治三年（1864）方转运回乡。江浙一带藏书大部分被毁，而衍芬草堂所藏幸得保全，蒋光焄可谓功不可没。清代张裕钊在其文集中谈及此事：

海宁蒋君寅昉好读书，藏图籍数十万卷，其笃好之深，殆非世人所能易也。遭粤贼陷浙东，西出走海上，溯江以至于楚，转徙江汉之间，然必以其藏书自随，不少时委去。盖好之至于此。（张裕钊《濂亭集·文集》）

然而，蒋光焄当年护书始末相当曲折，既非寥寥数句可以概括，亦非某些文章所言光焄仅凭私己之力将书籍搬上舟车。笔者有幸结识蒋光焄后人，得闻其千里护书始末之详。

咸丰十年（1860）四月，太平军直逼嘉兴，海宁屡有警报，蒋光焄携家渡

江至绍兴寿胜，仓皇避难之际，他并没有置藏书于不顾，而是安排专人留守看护，但事态发展却超乎预料。蒋光焄走后，护书人便频繁通信汇报硖石的情况：

不料硖石竟遭如此大劫。廿九日王店失陷，初一日屠殿寺失陷，初二日路仲亦陷，初三日寅前至硖，初七日早上退出镇上，焚去半镇……内屋烧去两埭及茶炉子间，其余五研斋、衍芬草堂一直至后皆不动，惟墙壁坍倒数壁……晚等初三日午前，见火烧冲天走出。现在土匪甚多，乘机抢劫，不可言状。（浙图藏清人信札）

社会混乱，院落被烧，土匪增多等信息，使远在浙东的蒋光焄寝食难安，最终他决定在兵祸尚未殃及藏书之际迅速转移：

思不群斋书籍，初八日皆已装赴澈山。衍芬草堂楼上之书并画包十余个，六月间寄予萧田张福元家楼上固□锁好，此次同归南山矣。（浙图藏清人信札）

衍芬草堂内宋元本置于二楼，明本、抄校本、善本则存于楼内思不群斋中（陈从周《海宁蒋氏衍芬草堂藏书史与藏书楼调查记》），这些藏书都被蒋光焄派人分批转移：宋元本先于六月移出，八月又与思不群斋藏书一同运往澈山。历史很快证明蒋光焄的明智，因为其从兄蒋光照（1813—1860）的别下斋藏书，就在此时惨遭焚毁：

（八月）初五。晴。贼焚硖川东南湖大街，生沐、寅昉之居俱成灰烬。又至路仲，掠富室数家而去。未几官兵又至，掠贼所遗。兼土寇纵横，莫能抵御，以至十室九空，立锥无地，痛何如之。（管庭芬《芷香日谱》）

别下斋与衍芬草堂比邻而建，早年都是当铺仓库，墙基异常牢厚，时蒋光照携家避难于桐乡，把藏书匿于墙壁夹层之中，虽安排专人看护，但无法避免楼毁书亡的结局，大量善本、书版毁于一旦。蒋光照不久便在悲愤懊悔中辞世。

衍芬草堂藏书被转移至澈山，山中有蒋光焄另一座藏书楼——西涧草堂。西涧本是蒋家丙舍，咸丰七年（1857）修葺后，专门存放蒋氏先人藏书，戴熙曾为绘《澈山检书图》，钱泰吉、邵懿辰各作《图记》。西涧草堂枕山面湖，人迹罕至，匿书墓庐，足见蒋光焄用心良苦。

咸丰十一年（1861）三月，太平军占领澈浦。有位叫朱嘉玉的秀才，避难

澈山，无意间发现西涧藏书因事态紧急凌乱堆放，出于读书人对传统典籍的认同感，朱嘉玉开始义务检理书籍，悉数登录，写成《西涧草堂书目》：

篋者、笈者、囊者、束者，纵横纷沓，莫可寻览。既移榻展席，相与排比整齐，签别而簿录之……近东南数千里，半罹兵火，自金陵、维扬以迄吾郡，储藏之家，汗牛充栋，贼所过拉杂摧烧，甚或投诸粪秽，至惨且毒。独主人深匿重闭于萧条寂寞之滨，安然无恙。而予与二三好事，犹得于患难之余，读未见书，消遣世虑，岂不幸哉。录草目毕，爰书此谕草堂主人。（《西涧草堂书目识语》）

《书目》编成后，朱嘉玉请人转交蒋光焄，并与其友张鼎（字铭斋）每日清点、保护书籍。不久太平军多次入澈山，西涧草堂也陷入危境。咸丰十一年（1861）夏，蒋光焄再次转移藏书。为防不测，钱泰吉帮助联系海盐官吏，为移书寻求保护：

令亲钱兄来，接奉惠书……承示尊处书籍移往绍兴，属为拨差护送。兹晤星海兄谈及，仍附便舟前往，当与护照，并知会防海各船，俾有照应，自可一帆直达，无虑阻滞。乘便肃复，即颂旅安。（蒋鹏骞《故交遗翰·申祐卷》）

期间，蒋光焄共两次取书，计五十余箱，近万册。九月，太平军占领余杭，移书被迫中止，此时西涧草堂尚有近半书籍未取。蒋光焄由绍兴赴宁波，宁波是对外通商口岸，他认为太平军会对洋人有所忌惮，不料战火如影相随，因又于十月间携书乘船至上海。十一月底，太平军逼近上海，蒋光焄立足未稳，不得不为全家二十余口和万册藏书再次寻找退路。咸同之际，上海集中了大量难民，争相由港口走水路到后方避难（于醒民《上海，1862年》），蒋光焄的困窘亦可想而知。

就在蒋光焄一筹莫展之时，浙江人周腾虎（字弢甫）为他提供了重要帮助。蒋的挚友邵懿辰一直被曾国藩奉为师友，十一月杭州城破后邵氏失踪，曾一直托人寻找下落。恰好周腾虎受曾的委派至上海催办军饷，于是以委托蒋赴皖报告兵情为由，安排其全家携带藏书乘洋人轮船赴安庆。由于安庆之战刚结束，蒋光焄实际并未赴皖，而是转赴湖北，腊月二十八日到达汉口，历七天，经四省，行程数千里。具体路线为：上海—瓜步—仪真—金陵—芜湖—大通镇—九江—汉口：

周君改甫，适抵沪壖，相逢道故，承为作书通姓名于左右，并属光燠先游皖会，略述浙中糜烂情形，冀达钦帅。弟亦思一睹官仪，不啻再见天日。无如亲弱上下二十余人，不能暂泊，舟行若驶，竟达汉皋。（蒋光燠《敬斋杂著》）

翻开地图，谁都会惊叹蒋光燠当年所走的那条蜿蜒曲折的路线，除了大量藏书要在水上漂泊之外，更危险的是轮船必须通过太平天国首都金陵：

自此而上，沿江贼卡直接石头城外，两岸壁垒夹峙，旗帜密布，洋人关舱，禁人眺望。江中舟楫往来，操舟者发长如女子，皆我赤子也……江面最狭之处，洋船去岸不过数丈，一线咽喉，为其所梗，上下游不能通贯。（《敬斋杂著》）

字里行间都透露出身处险境的复杂心情。到达汉口后，由于难民众多，蒋光燠的书籍无处存放，只好转赴武昌。在周腾虎、杨象济介绍下，蒋结识了湖北督粮道张曜孙。张对这位不避风险携书而至的藏书家照顾周详，也颇愿一观蒋氏清秘，其中一部《肇域志》抄本，引起了张曜孙的浓厚兴趣：

亭林先生《肇域志》，德清许积卿驾部所藏。余少游北地，浙中仅一至，未得见也。亡友刘廉方曾见之，为余言。咸丰辛酉，秀水杨利叔又言，海宁蒋寅昉评事抄录一本。是年腊月，寅昉避寇乱，由沪上来鄂，赁宅武昌城中，与寓馆望楹，乃得识寅昉，出是书读之。书凡百餘万言。（张曜孙《肇域志序》）

张、蒋志同道合，相约刊刻此书，以终亭林之愿。不久张奉调上海督办税务，有意聘请蒋为其助手，故两人同赴安庆，面见曾国藩：

同治元年壬戌。侨居楚省。三月，谒曾爵相于安庆省城，从张曜孙观察之约也。仲远先生以中堂之命，筹餉于沪，招光燠司笔札，以六十金为聘。（蒋光燠《庚实斋读书年月谱》）

同治元年（1862）三月廿七日，曾国藩日记云：

早饭后清理档。旋至城外看亲兵营操练。已正归。见客四次。吴桐云与杨